

# 中国人 传统思维 方式新探

苏才·武殿一 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新登字 6 号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新探

苏 才 武殿一 主 编

王 前 (常务) 韩宏宇 孙宏安 副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0,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10 \frac{1}{8}$

印数: 1—5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谭 坚

责任校对: 徐 力

封面设计: 耿志远

插 图: 2

ISBN7-5382-2166-2/C · 127

定价: 5.50 元

## 序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一文化更新的过程中，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必须首先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提高、改进的过程有一个“出入”的问题。北宋时代，几位理学家，张载、程颢、程颐等，大都曾“出入老释”，然后创建了理学的理论体系。所谓“入”即入乎其中，对之进行深入的研讨，从而有较深的了解。所谓“出”是出乎其外，即摆脱了其所有的局限，超越了其理论水平。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才能超越传统的思维方式。

要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必须进行中外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这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中国过去在科学技术史上有重要贡献，然而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其故何在？中国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遭遇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决奋斗，终于打退了外国侵略势力，保卫了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故何在？这些都是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传统思维方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战国时代，儒墨号称“显学”，而儒墨的思维方式不同。道家誉议儒墨，其思维方式更具特色。名家之中，惠施“合同异”，公孙龙“离坚

白”，各有特点。佛教传入以后，带来另一类型的思维方式；唐宋以来，佛学中国化，其与中印本来的思维方式的关系更值得探索。这些都是思维方式在哲学中的表现。此外，诗人画师、工匠农圃，亦各有其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西学东渐以后，情况尤为复杂。传统思维方式久已在转变之中。我们研究传统思维方式，必须注意其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

辽宁省高等学校一些同志们发起编撰《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新探》一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力图达到新的水平。对于这一写作计划，我表示衷心的支持，于是略陈研究传统思维方式的意義，提供读者参考。

1990年12月，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 编者的话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曾讨论了这样几个“热点”问题：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二是人的思维方式的类型和变革途径，三是人的思想观念变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如果把这几个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就有必要研究一个更深入的，也更具一般性的问题，即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它具有哪些特点？研究它有哪些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显然，对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必将促进对前三个“热点”问题的研究，使人们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研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力求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进展，为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出我们力所能及的研究成果。

人的思维方式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哲学性质的问题。目前对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部分也都是哲学工作者，或者说是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然而，人的思维方式问题又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准确把握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本来面目和演变过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艺、宗教、民俗等各个领域，结合具体学科的知识 and 素材，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加工，这个任务就不是哲学工作者自己能完成得了的。因此，

我们组织了一个比较别致的协作集体，其中既有哲学工作者，又有从事科学史、医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教育、宗教等方面研究，且有一定哲学素养的理论工作者，大家一起来切磋琢磨，共同探讨各学科领域里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表现形态和变化规律。这种有着共同主题的跨学科协作，使我们受益匪浅。哲学工作者就此开阔了眼界，使哲学分析深入到各具体学科的实际思维形态中去。各学科的理论工作者也从协作中受到很多思想方法上的启发，提高了思维能力和水平。跨学科协作使这方面研究在深度、广度和效率上都可能新的更大的进展。然而，由于我们的协作研究时间还不长，目前取得的这一些成果还只是初步的。它们的价值如何，有待学术界同仁评说。不过，我们对这样一种研究方式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美国数学家维纳组织物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心理学家、电讯工程师在一起协作，搞出了控制论。他的跨学科协作给后人树立了方法论的榜样。我们这种协作方式也得益于控制论产生带来的方法上的启示。我们觉得，跨学科协作或许是使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得以深入的关键因素。这种认识能否成立，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实践的检验。

在我们这个协作集体中，除了少数几位年龄较大的同志以外，其余大都是中青年学者。在进入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研究这个新领域时，总的说来是经验不足，胆气有余。我们的认识成果未必很成熟，更谈不上尽善尽美，但我们仍然大胆地把这些成果抛了出来，希望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为了充分体现协作集体中每个成员的特点和研究进展程度，我们采用了论文集这种形式。但应说明，论文集中大部分内容经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协作和共同讨论，因而这本论文集总

的说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由于各篇论文的初稿是分别独立完成的，个别的重复之处在所难免。在有的问题上不同作者之间可能观点不完全一致。在目前阶段上只能见仁见智，不强求一律。我们相信，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将逐渐消除这些枝节问题，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加系统、完整、成熟，具有更高的质量。

我们这项有关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课题，得到了辽宁省教育委员会科研处的支持。1988年，辽宁省教委科研处把这项研究列为省属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给予了一定资助。辽宁省教委科研处原处长，现任沈阳师范学院副院长张金城同志、辽宁省教委科研处副处长孙强华同志等曾对这个项目给予很多指导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这项研究还得到辽宁省一些高校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工作上提供了一定方便。辽宁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有关编辑同志热情关心和支持这项研究，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和学术界同仁及广大读者见面。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我们这项研究最初是由辽宁教育学院、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学、辽宁中医学院等院校的理论工作者发起并承担的。后来，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又邀请了国内一些较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参加。我们荣幸得到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的关怀和指导。张岱年先生不仅对这项研究的基本设想、研究方案和基本观点提出过很多宝贵的指导意见，而且不辞辛劳，亲自为本书作序。他的热诚关怀和帮助使我们深受感动，也增强了我们搞好这项研究的信心。另外，北京大学傅世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辽宁大学郭国勋教授、乌丙安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研究员等著名学者，

也对我们这项研究给予不少指导帮助，我们都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我们这项研究开展时间不长，在许多方面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并且因学识所限，难免有一些疏漏和谬误之处，很需要学术界前辈和有关专家给予批评指正。因此我们热诚期待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和看法。我们希望就这个课题同有关专家、学者广泛交流思想，加强学术联系，进一步推动有关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活动，进一步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促进人们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以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苏 才**

1990年12月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之一程宜山同志不幸突然病逝。程宜山同志是我国学术界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他的去世令人十分悲痛。在此谨表示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1991年7月

# 目 录

|                          |           |
|--------------------------|-----------|
| 序 .....                  | 张岱年 (1)   |
| 编者的话 .....               | 苏 才 (1)   |
| 试论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 .....     | 武辉安 (1)   |
|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之短长 .....       | 程宜山 (17)  |
| “心的思维”断想 .....           | 王 前 (32)  |
| 从解释学角度看儒家哲学的思维方式 .....   | 李景林 (45)  |
| 试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悟思维方式 .....   | 王桂山 (61)  |
| 阴阳思维模式与中国古代科学 .....      | 朱亚宗 (74)  |
| 中国古典数学的思维方式 .....        | 郭书春 (89)  |
| 墨学思维方式及其历史命运 .....       | 李伯聪 (109) |
| “象”与中医的抽“象”思维 .....      | 刘庚祥 (123) |
| 唐宋诗人艺术思维的差异 .....        | 于景祥 (145) |
| 从《笔法记》看荆浩的艺术思维特征 .....   | 佟 旭 (162) |
| 中国传统戏剧体现的思维方式 .....      | 彭运生 (174) |
| 中国古代教育思维方式及其在近代的演变 ..... | 周 菲 (192) |
|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城邦时期         |           |
| 政治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 .....        | 丛日云 (205) |
| 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古代法律的影响 .....  | 于沛霖 (233) |
| 《孙子兵法》思维方式初探 .....       | 孙宏安 (246) |
| 中国古代宗教的思维方式 .....        | 李 申 (263) |
| 从“真俗二谛”的演变看传统思维方式 .....  | 陈咏明 (273) |
| 禅“悟”与审美中的直觉思维 .....      | 马国柱 (287) |
| 从宗教对农民起义的影响看传统思维方式 ..... | 赵洪刚 (304) |

# 试论中国人传统 思维方式的特点

武 辉 安

本文通过分析思维方式的几个主要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来探讨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并简论其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

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其存在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人们通过思维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表示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在分析思维方式时，认识主体的需要和愿望的指向是首要的构成因素，这一因素一般称之为思维取向。

思维方式作为人脑的产物，以一定时代的社会实践、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结构为基础，而且又是和观念相互影响的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达到相对稳定程序和样式的集中表现。<sup>①</sup>就是说，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民族性，不同的时代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特征。因而思维特征是分析思维方式时另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

---

<sup>①</sup> 参见王天恩：“思维方式学术讨论会在桂林召开”，《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思维方式是人在思维时，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通过一定的步骤所实现的思维活动过程的结构形式，包括思维立足点和出发点，以及思维角度和顺序等。<sup>①</sup>就是说，思维方式自身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并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和功能。因此，在分析思维方式时，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亦是重要的构成因素，一般称之为致思途径。

所以，分析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应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思维取向、思维特征和致思途径等几个方面入手。

从本质上看，思维方式就是人所创造的认识的主体性结构，它从认识的方面体现了人的存在方式，反映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的精神。<sup>②</sup>因而，思维方式实际上也决定着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的科学文化的特点。探讨思维方式对科学文化的影响，更有助于对思维方式的特点的理解。

## 二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思维取向主要是“人事”，实际上主要是以人为对象，很少以自然为对象；通常进行的是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sup>③</sup>。这种思维取向使中国人传统思维产生了这样几个特点：

### 1. “伦理本位”思想

由于中国传统思维主要以主体自身为对象，其思维取向，

---

① 参见王天恩：“思维方式学术讨论会在桂林召开”，《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② 参见何萍：“思维方式与认识论”，《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

③ 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

即主体的需要和愿望的指向是“人事”，即“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sup>①</sup>重人际关系，重的是伦理道德。这在中国人传统思维中占有主导地位。

所谓“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庄子·天下》）就是这种伦理本位思想的重要表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则是这种“伦理本位”思想的体现。这种伦理本位思想使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特别注重伦理政治问题。

先秦诸子学说，“皆起于救世之弊”（《淮南要略》）。诸子著书立说，只是为了“言治乱之事”（《史记·孟荀列传》）。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古人的思维中心是伦理政治——社会历史的治乱兴衰。<sup>②</sup>

这与古希腊人成为鲜明的对比。亚里士多德指出，古希腊“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sup>③</sup>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伦理本位思想指导之下，不是像古希腊的贤哲那样超脱“俗”事，埋头于哲理和自然的探索；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入世的、参与的态度。前述诸子都关心治

---

① 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年11月6日。

②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2页。

③ [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页。

乱，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达此目的，“学而优则仕”。“出仕”或做官是中国古人重要的人生目标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伦理本位思想特别把道德修养作为人格追求的重心，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主要的修行方法。<sup>①</sup>“出仕”又成为主要的修养手段之一。说来说去，都是要入世出仕。

## 2. 重价值判断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以价值判断统摄事实认识、融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的特征。”<sup>②</sup>事实判断是主体依其特定的方法、手段，对客体的本来面目、属性及其规律的反映，是对其真伪的认识，它要求人们客观地把握事物。而“‘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sup>③</sup>价值判断是主体对客体是否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好坏、善恶”的判断，它是依主体的需要为转移的。由于思维取向是人事，认识对象是主体本身，因而中国古人必然重价值判断，以价值判断来统摄事实判断。而由于前述之伦理本位思想，价值判断在中国古代又往往为道德判断所代替。即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常以道德规范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作为标准。

这一点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中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观物比德”，把对外在世界的认识转化为道德说教；把所有的知识与“人事”联系起来，有所谓“天人合一”的观点。二是“重义轻利”，一切行为以道德观念为准。合乎道德

---

① 李宗桂：“从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看中国传统心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② 黄卫平：“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

标准的，即使极端功利主义的行为也成为“义”。例如“出仕”做官，本来具有极端的功利性，但由于目的在于“修齐治平”，符合“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即是义举；不符合封建道德的，即使只有小利，也不允许，如历代都抑制商贾。

### 3. 重实用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切学问，都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人们追求的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纯知识，也不是知识之间的纯思辨的逻辑关系，而是如何把握事物间的关系，使之“有用”化。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修齐治平”的用，即直接的人事上的应用。这是以人事为思维取向的必然结果；既然以主体自身为对象，那么对主体有用的就是最有价值的应肯定的东西。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这种思维取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使中国古人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自强不息，正道直行，求是务实，豁达乐观等等。同时对中国古代科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科学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1) 科学实用化。一方面使当时的科学原理都采用了便于应用的简洁而直观的表述形式，如数学采用了应用问题集的表述形式；另一方面又使具有“实用性”成为对科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只有实用的科学内容才能得到发展。这使得在中国古代，科学有与实际（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密切结合的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却产生不了诸如古希腊科学那样离实用较远且形成为理论体系的（理论）科学。

(2) 科学理论技术化。科学理论由于较少直接的实用性，因而在中国古代少有发展。能直接实用的是技术，在实用中

技术能得到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代缺乏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知识，更少有系统化的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实用技术则比较发达。如天文学理论较少变化（两千余年始终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这几种说法，每一种都没有十分清晰和深入），但历法编算技术却不断发展，曾达到过十分精确的程度；医疗技术十分高明，相对于不断丰富发展的医疗技术而言，医学理论就比较落后；农业技术相当出色和成功，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农学理论，农学理论就包含于农业技术之中。甚至数学也是这样，没有形成逻辑严格的系统的数学理论，而计算技术却达到十分先进的程度，使我国古代数学取得过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3）科学知识伦理化。把知识转化为对自身的道德内省，这也是知识的“实用”方向之一。这使中国人把某些科学既看作是技艺又看作士人道德理论修养的一个环节，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是一个人的素养之一，是道德内省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科学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而不断要求“技进乎道”，作为道德修养之一的科学，是根本无从理论化、逻辑化的。

（4）科学政治化。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一切利益都是与政治特权分不开的。因此做官、谋取政治特权就是最重要的实用。各种知识，“包括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其价值则远在权力之下且主要地作为获取权力的手段，独立的价值微乎其微”。<sup>①</sup>科学成为进行政治活动、谋取政治特权的工具，许多科学工作者亦是政府官员。因而科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国古代帝王的头一个政

---

① 封祖德等：《开放与封闭》，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治行动就是表明自己的王权神授，合于正统，即所谓“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受命于天也”（《汉书·律历志》），颁历成为重要的政治行为。由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天象观测和历法编算——十分发达。据统计，由战国到元代1000多年间颁布的历法竟达87部之多。<sup>①</sup>不仅如此，有人还认为，中国古代历法主要是为星占术服务的，<sup>②</sup>通过星占术，天象和历法又与“人事”联系起来了——用于预测人事的吉凶，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由于天象观测和历法编算具有重要的人事意义，以至于成为国之大事，历来由政府主持。天文学家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天文学还成为历代“官学”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这样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文学及与之有关的科学（如数学）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化又使科学成为政治的实用工具，不仅没有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科学，而且政治化就是介入人事活动，使科学随政治的变化而消长。历史上不乏因政治而毁弃学术的事，使科学知识的积累十分缓慢。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反复、曲折甚至中断的过程。

### 三

中国人传统思维具有整体性和辩证性的特征。

“万物一体，大化流行”是中国古代的典型观念。这种观念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所谓有机整体，指的是认为每一个现象都是按照某种等级秩序和其他现象联系着的，通常可以由自然推及人事，由人事推及自然，从而表明自然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第561页。

② 江晓原：“中国古代历法与星占术”，《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3期。

和人事是由同一个法则维系的——万物一体。<sup>①</sup>因而自然的变化可以在人事中寻找原因，而人为的一切也可以毫无例外地推到万物中去。

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整体性特征，在三大“合一”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自然观方面的“天人合一”，即认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识论方面的“知行合一”，即知识和行为、道德与践履的贯通统一；审美方面的“情景合一”，即主体的情感与客体的景致、情志与自然融而为一，追求“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美学境界。<sup>②</sup>

这种整体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系统论的特点，并通过阴阳五行宇宙图式表述出来。中国古人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四十二章》）。“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是以阴阳统摄五行，以天道附会人事，五行相生相克、循环不已的一种思想。它把天地万物通过阴阳五行结构的方式组合起来，而其各个部分互相渗透联系。把自然规律和人事活动及经验糅合在一起，使整个宇宙在结构上保持与人事相联系的特点。

在这一结构中，整个自然、整个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包括时间、空间、人体、社会制度、伦常秩序都被安置在一定的位置上，它们的功能正是由于它们的结构才得以展开。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万事万物组合成为一

---

① 许苏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② 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224页。